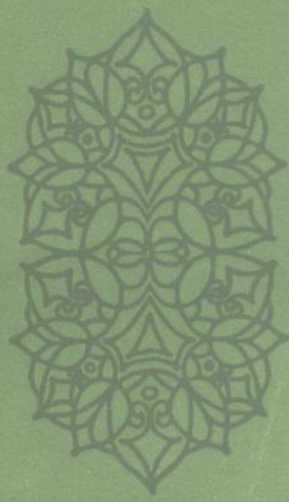




子雲鄉人類稿

齊魯書社



子云乡人类稿

殷 孟 伦

齐 鲁 书 社

一九八五年·济南

子云乡人类稿

殷 孟 伦

齐鲁书社出版发行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5.25印张 2 插页 340千字

1985年2月第1版 1985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000

书号9206·10 定价 3.00 元

序

本类稿所收的文章，多是从过去写的有关语言文字之学的专题论文中选录的，共二十五篇，辑为一册。其中有解释、评价前人语言文学专著的，有研究汉语词汇语义演变历史的，有总结前人语言理论的，有探讨文学名著语言技巧的，也有揭发前人伪作的，如此等等。总起来看，大多数都可纳入汉语言文学和汉语研究史的范围。三十年代初，我侧重于诗 歌 文 辞 之学，四十年代起，致力于语言文字之学。其间，遇到特别感兴趣的问题，便写成专题论文，对传统语言学或语言学界提出的某些观点不敢苟同时，也写过一些商榷性的文章。积时既久，篇目遂繁，仅撷取其中部分集为本类稿。就治学方术而言，以归纳、类比是尚，实事求是，不敢放言高论。惜余治学范围不广，于语言文字之学不能发扬而光大之。属承齐鲁书社不弃营删，为之印行，谨以求教于世之方闻之士。

殷 孟 伦

时在一九八三年元月数旦。

目 录

序

略谈“训诂学”这门科学的对象和任务·····	(1)
训诂学的回顾与前瞻·····	(18)
论治中国语言文字之要籍·····	(43)
从《尔雅》看古汉语词汇研究	
——批判继承中国语言学优良传统的一个实例·····	(60)
《尔雅》郭氏纂疏举例·····	(86)
《方言》与汉语方言研究的古典传统·····	(132)
《说文解字》形声条例述补·····	(153)
段玉裁和他的《说文解字注》·····	(197)
王念孙父子《广雅疏证》在汉语研究史上的地位·····	(215)
黄侃先生在古汉语研究方面的贡献·····	(235)
谈谈汉语词汇研究的断代问题·····	(254)
《果羸转语记》疏证叙说·····	(262)
“闻”的词义问题·····	(272)
关于汉语复音词构词形式二三例试解·····	(286)
《四声五音九弄反纽图》简释·····	(300)
试论司马迁《史记》中的语言·····	(325)
从《魏其武安侯列传》看司马迁《史记》的语言艺术·····	(348)
如何理解《文选》编选的标准·····	(368)

略谈《红楼梦》作者曹雪芹对语言艺术的认识(389)

略谈《红楼梦》的人物语言

——以王熙凤语言作例(396)

莫友芝与《韵学源流》的关系质疑(422)

校读偶记

——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里的错字.....(442)

试论唐代碎叶城的地理位置(450)

《补记袁滋》之续(470)

采僚说(478)

略谈“训诂学”这门科学的对象和任务

“训诂学”这门科学的对象和任务的问题，自来论者涉及这方面的很少，即有涉及，也还没能够得到一致的看法；同时在教学上也还存在着许多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的问题。这里所提出的，只是平日师友的讨论和自己学习后的一个初步认识。

一

“训诂”是用语言分析语言、解释语言，而“训诂学”是怎样理解语言分析语言和正确地运用语言的科学。在中国语言学内，这是一个重要的部门。它的命名，是中国学术上一个传统的惯用语，因为语言是属于历史范畴的。“训诂学”是以分析语言、解释语言（无论口头的或书面的）作为研究对象的。所谓分析语言、解释语言，是结合两个方面来进行的，一是语言内部要素诸问题和关联，一是语言所反映外部事物即所依赖的社会生活、社会环境以及文物制度等诸问题和关联。为了正确地理解某种具体的语言事实，在一定的相应的语言环境和需要下，以分析解释作为手段，或以此地的语言说明彼地的语言，或以现代的语言说明以往各个时代的语言，或以朴质的语言说明修饰过了的语言，或以明畅的语言说明简约的语言，凡此种，都要结合语言事实和所依存的关系来进行分析和解释。这

样才能够正当明确地表现语言的传达作用，因而人们在语言学习的过程中，对于语言的掌握和运用也就得到了提高和培养。惟其如此，才能显示出“训诂学”这一科学的独特性和必要性。二千多年来，研究中国语言学、历史科学、文献学、考据学、考古学和文学等等的学者们都把“训诂学”放置在极其重要的地位，同时也把它作为研究学术必需掌握的主要工具和“入德之门”。

训诂一词，在二千年前的古籍中已经出现，它所具有的涵义，从许多学者的理解而得到具体的说明。例如：

许慎《说文解字》：“训、说教也。”又：“诂训，故言也。”

张揖《杂字说》：“诂者、古今之异言也。训者、谓字之意义也。”（《尔雅释文》引）

《毛诗疏》：“尔雅所释，十有九篇，独云诂训者，诂者、古也，古今异言，通之使人知也。训者，道也，道物之貌以告人也。释言则释诂之别。故《尔雅序篇》云：‘释诂、释言，通古今之字，古与今异言也。释训，言形貌也。’然则诂训者，释古今之异辞，辨物之形貌，则解释之义，尽归于此。释亲已下，皆指体而释其别，亦是训诂之义，故唯言训诂，是总众篇之目。”

郭璞在《尔雅·释诂》始也条下注：“此所以释古今之异言，通方俗之殊语。”

如此之类，解释之说尚有不少，但大体无什出入。训与诂在分用上虽然有别，但在复合使用上就不必强为分别，可以看做是同义词。例如段玉裁、王筠、马瑞辰等就是这样看法：

段玉裁《说文解字》诂字下注：“《尔雅》析故言训为三，三而实一也。”

王筠《说文句读》诂字下注：“诂训（句）谓诂训同义也，《尔雅》释诂、释训，虽分两篇，义实同也。”

马瑞辰《毛诗故训传名义考》：“诂训本为故言，由今通古，皆曰诂训，亦曰训诂，而单词则为诂，重语则为训诂。”在这些说法中，我们可以明白，训诂就是解释，而所解释的范围所涉甚广，可以说语言所能代表的内容实质，语言所具有的表达形式，都是它所要分析解释的对象，绝对不限于一字一词便已尽其能事。例如《尔雅·释言》在“式微式微”下便说“微乎微者也”，这当然是通释全句；《诗·毛传》在谷风“习习谷风，以阴以雨”二句下便说：“兴也。习习，和舒貌。东风谓之谷风。阴阳和而谷风至，夫妇和则室家成，室家成而继嗣生”，这当然于释词义之外，又特别说出它隐喻之义；又如在《静女》、《瞻卬》、《车攻》等《诗》的《毛传》中，除释词义之外，又涉及到古代的制度；《杕杜》、《巷伯》、《鹑》、《行苇》等《诗》的《毛传》中除释词义外，又涉及到故事和史实；这样的解释就和春秋左氏传相同，不但就文立解，而且详征故事了。又如《易经》在“潜龙勿用”句下面接以“阳在下也”，在“见龙在田”下面接以“德施普也”，在“终日乾乾”下面接以“反复道也”，象这一类便是泛论义理，推寻这句话所以如此之故，这不能说不是解释吧。

“训诂学”既然是用语言分析语言、解释语言，就要把所分析解释的语言做到毫不走样的传达，这对分析解释的本身来说，也是语言方面的一个创作活动的形式。只要做得好，不但能够达到正当明确的理解，而且可以收到交流思想、发展智慧的必然效果，这样做既是手段，同时也是最终的目的。由此可见，“训诂”在语言传达中所起的作用，也就是同语言在生活中经常所起的那个作用一样。因此研究语言的正当明确的分析解

释，借以推求其正当明确的由来，因而得其正当明确的运用，使所分析解释对原来的语言表达不失其完全性和确切性，这就成为“训诂学”研究者所应具有的共同倾向了。

有许多人对于“训诂学”这门科学的了解还有些不全面，例如有的认为训诂学是书本子上的考古学；有的认为是研究古代语言文字的意义的一种专门学术，这都有可以商榷的地方。过去沈兼士先生曾经把“训诂”区分为纵横二方面的研究，他的办法是把训诂分为三个部分来叙述：

（一）训诂学概论——总论它的源流、要义和研究的方法；

（二）代语沿革考——是纵的研究，目治地依据古籍来探寻历代文语蜕变的轨迹；

（三）现代方言学——是横的研究，耳治地研究现代各地方言流变的状况。（详见沈兼士：“研究文字形和义的几个方法”一文中，北京大学月刊一卷八期。）

照沈先生的分法这样做是不够具体的（当然这是沈先生早年的见解），这里的“代语”一词照沈先生的意思来理解，是指的“历代的语言”，是训诂学术语。但是语言有它极其稳固的部分，所以我们不能只谈每个时代的特殊情况而忽略了一般。就方言说，也不能只谈现代，历史上也有方言的现象存在（不过有些是难于考订的），尤其是我们更不能把“训诂学”就代替了方言学。

我们认为前代学者对训诂学的体用的了解，如下面所引郭璞《尔雅·序》中的一段话是具有代表意义的：

“夫《尔雅》者，所以通训诂之指归，叙诗人之兴咏，总绝代之离词，辨同实而殊号者也。诚九流之津涉，六艺之铃

键，学览者之潭奥，摘翰者之华苑也。若乃可以博物不惑，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者，莫近于《尔雅》。”

此所谓“诗人兴咏”，“绝代离词”，“同实殊号”的“叙”、“总”、“辨”，不但指出训诂的作用，而且实在就是在训诂范围内所应有之事，看《尔雅》本书就可明白。所谓“博物不惑”，的确是研究“训诂学”者应有的素养，也要在这样的素养的基础上，才能正确地理解“训诂学”。

二

训诂的产生是和语言的表达分不开的。

训诂的问题，一般认为只有对于古代文献的分析解释才会存在，这种看法是不全面的。实际上，我们现在每天所接触到的语言事实，需要分析解释的地方并不见少。例如我们读报刊的时候，就常常有这样的感觉，因为所接触的新事物太多，不解释不行。报刊在刊登某一文件或某一报导的同时，作了某些解释或介绍，一并刊出，这我们对时事新闻的了解，某一学术内容的了解，是有很大的帮助的。例如我们看到了论哲学的文章的同时，也看到了有关哲学术语如规律、运动、联系、发展、变化之类的解释，我们看到伏罗希洛夫同志来我国访问，我国热烈欢迎国宾的情况的同时，也看到了有关伏老的生平事迹等等。在我们读到“毛泽东选集”时，在每篇文章后面，也读到许多注释，例如“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一文的第（三）条注说：

这里所说的十年内战前期，是指一九二七年底至一九二八年底的时期，亦即人们通常所称的井冈山时期；中期是指

一九二九年初至一九三一年秋的时期，即自中央红色根据地的创立至第三次反“围剿”战争胜利结束的时期，后期是指一九三一年底至一九三四年底的时期，即自第三次反“围剿”战争胜利结束后至党中央在贵州遵义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时期。一九三五年一月的遵义会议，结束了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内的统治，使党回到正确的路线上来。参看本书附录“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三部分。

我们再看去年（1956）一月印行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毛主席所作的序言上曾经说道：

收在这本书里的所有的材料，都经过负责编辑的几个同志在文字方面作了一些修改；对于一些不易看懂的名词，作了一些注解；又按问题的性质作了一个分类索引。

可见当代人的文章和报告有了“一些不易看懂的名词”非作一些解释不可，解释的工作之必需，并不在时间的古今上去分。就是面对面的交谈，有时说者对于听者也得要加以解释才能把语言传达得完全和确切。

训诂的产生，完全看需要不需要，这是丝毫无可置疑之事。如果需要，训诂就是认识语言、掌握语言的必然产物。如果需要，在使用语言作为表达形式的同时训诂就已存在，并不是有待于后，或以望之来者。我们从文献上了解，远在先秦时代，就有出现在作者所作文章里面的事实。可能在更早的时代，当面交谈，已经采取了这种语言的表达形式，这不一定是不会有的事。因为它所引起的效果是加强语言表达的明确性、形象性和逻辑性，所以作者在行文情节的适当处所，往往不自觉地插入必要的语句作为解释，用以启发读者，引起读者

的特别注意。在先秦文献中，比如《易经》、《左传》、《国语》、《大戴礼》、《礼记》、《孟子》等书，这种事例，已经是屡见而不一见。下面举一些作例：

“穆伯如齐，始聘焉，礼也。凡君即位，卿出并聘，践脩旧好，要结外援，好事邻国以卫社稷，忠、信、卑让之道也。忠、德之正也；信、德之固也；卑让、德之基也。”

（《左文公二年传》）

“今也不然。师行而粮食，饥者弗食，劳者弗息，睚眦胥谗，民乃作慝。方命虐民，饮食若流，流连荒亡，为诸侯忧。从流下而忘反谓之流，从流上而忘反谓之连，从兽无厌谓之荒，乐酒无厌谓之亡。”（《孟子·梁惠王》下）

其次，就是作者行文引用前代文辞作为自己立说的佐证时，也往往在引文后面加一番解释，这种解释也为的使语言表达更具有说服力。比如在《孟子》中即有其例：

“……其诗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孟子·梁惠王》下）

“……书曰：洚水警予。洚水者，洪水也。”（《孟子·滕文公》下）

“……诗曰：天之方蹙，无然泄泄。泄泄，犹沓沓也。”（《孟子·离娄》上）

不但如此，即使在行文中，所已采取的语言表达形式，虽然不象上面的那样，但就其本质来看，仍然是可以作为这样的理解的，也不乏其例。如说：

“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左宣公十二年传》）

“礼者，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以为民防者也。”（《礼记·

坊记》)

甚至象“夫兵，犹火也。”（《左隐公四年传》）“夫善，众之主也。”（《左成公六年传》）如此等类，未尝不可作如是观。因为当写出这样文章的同时，就已经有这样概括性地代表思想实质的语言形式出现，这才能加强说服力量，才能动人。此外有用声训的例子，比如：

礼者，履此者也。义者，宜此者也。（《礼记·祭义》）
德也者，得于身也。春之为言蠢也。夏之为言假也。秋之为言愁也。冬之为言中也。（并见《礼记·乡饮酒义》）
仁者，人也。义者，宜也。（并见《礼记·中庸》）
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孟子·滕文公》上）

有说明其命名的语源的例子，比如：

赐姓曰妘，谓其能以嘉祉殷富生物也。赐姓曰姜，氏曰有吕，谓其能为禹股肱心膂以养物。（《周语》下）

当然这些都不是在文章以外另加的解释，而是在文章中即已经具有解释作用的语言形式。又如荀子在他的文章中常常有定义式的语言出现，如性恶篇、解蔽篇、正名篇里面就可看见。汉代司马迁的《史记》也常在行文中穿插着带解释性的语句，例如在《项羽本纪》“亚父南向坐”后，“沛公北向坐”前，插入“亚父者，范增也”一句，又在《魏公子列传》“吾过大梁之墟，求问其所谓夷门”之后，即接上“夷门者，城之东门也”一句，这样的穿插，正表明范增在项刘斗争中是一个极关重要的角色，夷门是一个极有纪念性的城门。

语言的表达，它在当时的情况下，须得有解释性的语句的穿插，既使如此，一旦时间空间的关系有了迁移转变，不能达

到直捷了当的理解，疏通注释，那更有其必然之势。所以古人的著作，有了注以后，又得要就注作疏，有了一家之注以后，还要有其他各家的注，有了旧注旧疏，又还要新注新疏。这不是迭床架屋，而是为了需要（如果不需要，就不必多此一举）。时代愈向前进，语言的作用愈大，对于古代有生命的语言也须吸取来充实当代的语言。因而要分析语言，解释语言的事也就愈益重要。清代学者陈澧说：

“盖时有古今，犹地之有东西，有南北；相隔远则语言不通矣。地远则有翻译，时远则有训诂，有翻译则能使别国如乡邻，有训诂则能使古今如旦暮，所谓通也。训诂之功大矣哉！”（《东塾读书记》）

时与地的关系，表现在一纵一横，从三代秦汉之相延相续以至于今，从西藏高原、川、湘、鄂、皖之相毗连以至江、浙滨海，其情况颇相类似，所以通其古今别国，而能使之如旦暮，使之如乡邻，这正显示出训诂对于语言的表达作用所负的极大任务。陈氏又把训诂比之于翻译，这更给我们以莫大的启发。翻译也有其必不可少的基本原则：译文语言要完全而确切，并表现出民族色彩、历史色彩等等。如果说能把语言分析得好，解释得好，这就正说明训诂之学之所以必需了。

语言事实的理解之所以成为问题，训诂的工作之所以必需，主要有四种原因：一是出在语言事实的本身上；二是出在语言所依存的社会诸关系上；三是出在汉字（记录这种语言的工具）的特殊情况上；四是出在使用语言者和接受语言者的具体情况上。

所谓语言事实的本身，本来就是一个复杂的整体。从语言到词汇、词义和语法，从口语到书面语，到文字体系，从现代

语到古代语，从方言到标准语，从本国语到外国语，如此等等，现象非一，单从某一个情况来看，这已经够复杂，而他们的相互错综、相互关联，其复杂程度更为突出，再从语言的各个部分的发展过程来看，其错综复杂又不知达到怎样地步。当然在仓猝间一接触到某一具体语言，说不了然，不懂得，那不是不近情理的事；要说一下子就能明白透彻，一目了然，那种可能是很少的。就语言来说，两汉之于先秦，已经不同，六朝唐宋之于两汉也不一样，元明清之于唐宋又更有其显然不同之点。而方言的转变也呈现出非常复杂的局面。所以宋代朱熹作《诗集传》，对协音的问题就搞不清楚，何况于通常人。词汇除基本词汇外，变化也很大，很能看出各个时代社会发展的面貌，然而有些形音不变而意义变了的词也很多，比如“劳动”一词，如以今义释古义，固然不可，即以古义概之今义，也未必对。构词的方式，后代也有新出的现象，也不可完全一概同古代等同。语法结构是比较稳固的，但是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某种结构的普遍应用，也显示出某一时代的特征来。至于成语、词例、韵律、文体等等，古今的距离越大，语言事实的理解问题也会愈来愈有增加。

语言所依存的社会诸关系的问题，在中国历史悠久的情况下，其复杂程度也过于任何其他各国。所有经济、文化、政治，社会生活、日常生活等，都各有其具体的复杂内容，都成为专门研究的对象。因而在制度、名物、风俗习惯等方面都是各具特点，各有表现。要是单从语言外形着手，而不了解语言事实所代表的内容实质，可能对语言的了解仍是隔膜，当然更说不上什么叫透彻，举一个最普通的事例来说，如果把汉代的“免冠”理解成现代的“脱帽”，那岂不成了笑话？从前人也有“读

《尔雅》不熟，几为“劝学”死”的故事，可见对于事物一点也不能马虎。

汉字是属于象意文字，从它的形体演变，上自甲文金文的形体结构，历经改变，以成今日通行的文字形体，如果检查一下这一类的书籍，真是使人目迷五色。所以“书三写，鲁成鱼，帝成虎”，是非常可能的事，因而要了解语言，不能不留意书的版本和校勘的学问。要是能够象孔子读史知道“伯于阳”是“公子阳生”之误（《公羊昭十二年传》）子夏读晋史知道“三豕渡河”是“己亥渡河”之误（《吕氏春秋·察传》），又能够象刘向父子之校正群籍，这样才能保证不出现讹误，不然很容易蹈上把“郁郁乎文哉”作为“都都平丈我”的危险。问题还不止于此，象乱改古书，也有的是，如唐玄宗李隆基把《书·洪范》“无偏无颇”之“颇”改为“陂”和下文“遵王之义”的“义”协韵，稍不了解，就只好跟他一样的糊涂了。在中国历史有一件毫无道理的事，是属于文字缺避的问题。今人也有“史讳举例”这类的著作详载这些问题，例如北宋刊本书对于“匡”“允”“宏”“殷”“恒”“贞”等字都阙笔。而改字的如“民”作“人”，“渊”作“泉”、“世”作“代”之类也很多。甚至国家考试，遇应避的字而不避，应试人还要受到惩罚，这样的避忌，真是凭空给学习文字的人加了些负担。今天当然不会再有这样的问題，但是面对古籍，却也是个严重的问题。说到汉字中文字通假的现象更算得上普遍、严重，这对语言的理解也往往造成错觉。如“光被四表”的“光”字、清代学者戴震、王引之等都指出是“广”字的借用，纠正了历来把“光”作“光明”解的误说，可是博学如俞正燮，他却回护古说，仍然作“光明”解。看来，这种错觉虽贤者也有所不免了。